

# 王毅然长篇小说



# 《归去来兮》



## 研讨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12月9日，由大理大学文学院、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大理州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王毅然长篇小说《归去来兮》研讨会在大理大学文学院举办。本报今日推出“洱海·文艺评论”专版刊发研讨会发言摘登，以饕读者，敬请关注。

### 微澜中见山海，毫末处显风云

□ 农为平

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建构历史，一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其根源，在于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理性”这一深刻洞见。亚里士多德所说之诗，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是指包括史诗、悲剧等在内的各类文学形式。大理本土作家王毅然的长篇小说《归去来兮》，正是对这种文学传统的呼应与成功践行。

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小小说里，作者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生命轨迹的叙述，建构起一幅边地历史的壮阔风云图景。这一视野与创作诉求，对于本土文学建设是极具特殊意义的。在传统的流俗文学叙事中，云南边地往往是被遮蔽的、缺席的，或是在充满想象的臆造中要被妖魔化、要被理想化。这是一种在长期传统中心观主导、支配下而形成的特有文学现象，折射着根深蒂固的刻板文化心理。而本书作者是完全站在本土在地者的视角、立场叙事写情，将主人公命运嵌入边地独特的历史河流之中，完成了一场以微观显宏观、以个体命运见时代风云的厚重历史叙事，既显示出作者对作史诗品格的自觉

追求，也为云南文学的自我历史言说增添了一份鲜活范本。

小说显在的历史叙事策略，还与当代新历史主义的“微观史学”主张相暗合。这种微观史学拒绝将历史简化为线性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是从个体经验出发，从个体的“小历史”窗口来映射出大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这一点上，《归去来兮》无疑是出色的。在面上，小说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叙事起点，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边疆建设，贯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边地历史风云；而在内里，作者又巧妙借助家族历史回顾，将明朝移民云南屯屯、南明皇帝朱由榔流亡云南、滇缅抗战等与云南直接相关的重大史实穿插进入叙事之中，将现实与历史无缝勾连，在不动声色中大大延展了作品的历史时空，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小说的历史内蕴，展现出作者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叙写边地历史的宏远意旨。

小说的历史丰赡性还表现在复调叙事结构布局上。小说以上部、下部分别讲述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在开篇设置

了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却跳出出落难才子佳人历尽劫难终成眷属的传统窠臼，出人意料地以一个意外事件将两人分置于国境线两端，走上迥然各异的人生路途。这样的设置极具云南的边地地域特性，也在其间自然植入六七十年代部分知青怀着理想激情去支援祖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真实。这种双线叙事就把小说的空间拓展到国境之外，在充满异域情调的讲述中形成对边地历史的多视角、立体观照与辐射，从而建构起个人—时代—地域的三重历史叙事维度。

另外，从叙事内容上说，这部小说同时还可视为一部边地成长小说、改革小说、官场生态小说、民俗文化小说，其所包蕴的叙事内涵是多元而富足的。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受得到其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积淀和修养，以及一种贯穿始终的动人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这些，正是小说得以成功建构边地历史叙事根基与元素构成。

(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平凡疆域的精神版图

□ 于昊燕

当我们在谈论一部小说时，常被精巧的结构、繁复的隐喻与华丽的辞藻所吸引。然而，一部语言质朴、叙事直白，却扎根于特定地域土壤的作品，反而能以最原始的力量，叩开我们认知世界的一扇新窗，勾勒出一个真实、具体、多维度的基层生活世界。

王毅然长篇小说《归去来兮》的力量，首先来自珍贵的“地方性知识”。当代文学版图在中心叙事的主导下，边缘地带的生活经验常被简化、浪漫化甚至奇观化。《归去来兮》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预设地呈现了一个边地小城特有的生活质感——人际关系网络、季节更迭中的劳作方式、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碰撞。作家以近乎人类田野调查般的耐心，记录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喜怒哀乐。这种细致入微的描摹，构成主流叙事的重要补充、修正，让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基层生活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让生活本身的真实来打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处理个人

与时代关系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没有将个人命运简单地捆绑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上，也没有陷入纯粹私人化的喃喃自语。小说中的年轻人历经着边疆区域缓慢而深刻的变迁——新公路的开通改变了物资流通的方式，外出务工大潮冲击着传统家庭结构，教育机会的增加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这些时代变迁不是作为背景板存在，而是内化于每个人物的具体选择与日常困境中，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既有个体温度的真切，又有社会历史的厚度。耿卫疆与林苍秀的生命脉络串联起人物群像，构成了边地社会的微型全景。每个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生活轨迹与命运逻辑，他们不是主角的陪衬，而是各自生命故事的主人公。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个人中心主义，呈现了一种更为平等、网状的生命观。每个平凡个体的生命史都被认真对待，共同编织成边地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网络。

这部作品的表达手法的单一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艺术感染力，心理描写的欠缺使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未能充分展开，叙事节奏的平铺直叙也可能让读者感到沉闷。这些艺术上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可能达到的文学高度。但反过来看，这种“不完美”恰恰成为作品真实性的一部分——它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矿石，保留了生活最原始的粗糙与重量。

在当代文学日益精致化、同质化的今天，这样一部扎根于特定地域、忠实于生活本相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学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形式的创新与语言的实验，同样存在于对普通人生命经验的诚实记录与深刻理解。文学不仅属于中心的辉煌，也属于边缘的坚韧。王毅然用直白的语言讲述着边地小城人们的生命故事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守护与抵抗——抵抗遗忘，抵抗简化，抵抗那些将多样生活经验纳入单一叙述框架的力量。

(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 草木生发 人间温度

□ 钱金祺

我是学药学的，一般不读长篇小说，因为会读着后面，前面的已经忘记。闲暇时只看《读者》杂志上一两页纸的短篇小说。但最近怀着一种空白之心和好奇的心情，认真拜读了王毅然所著的《归去来兮》，原因是作者曾经是学校的领导和同事，曾经在本校共事多年，心里想了解一下作者写了些什么。再者本人也爱在电脑上捣鼓文字，想要学习一下作者是怎样把人生经历变成一部小说的。

这本书的上部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作者人生旅程的真实记录。小说从下乡知青开始，一直写到从政的经历。书中每一个故事情节，无不反映着作者对事业、对地方官场的所思所想，承载着一个地方干部的成长过程，呈现了一个边疆县域的变迁发展历史。

我经常在脑海里认为书中的那个“我”，就是王毅然本人。这也是我爱看该书的原因。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我”这个青年人的成长的过程中，自然带出了作者和我们50后一代人经历的真实社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知青下

乡。每一次工作调动或升迁，都是组织对个人命运的安排和对新工作的挑战，多岗位工作，丰富了作者多彩的生活，为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作品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因故是来自生活，因而很生动，如同发生在我自己身边一样。这是第一个看点。

再是平日里，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幽默开朗之人，成书之前，茶余饭后作者亲口讲过的许多幽默段子也经常出现在书中，读来甚是亲切和感人。我曾对妻子说，他写下这些含泪的笑话时，也写下了生活真实的一面。我还发现作者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和观察力，而且还能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是该小说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第二个看点。

写书和读书都是分享的过程。书中的故事都是作者成长过程和职业人生的独特体验。书中有两条明显的故事线索，一条是从政的内容，另一条是“我”的爱情。因此从书中的字里行间还看到了作者曾经是一个情感丰富的青年，也看到了作者在边疆乡镇和县干部工作的一路风景和不易。但作

者始终用阳光、积极的心态来描写那些艰难的日子。用一个作家说过的话，就是用太阳的心态来描写月亮，用白昼的心态来描写黑夜。这是第三个看点。

作者从政以后，一直勇往直前，用人生的步履丈量了边疆的山山水水，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深思熟虑的思考，最终穿透了岗位的层层迷雾，能在不同的单位从事领导工作时都得心应手，也获得同事和下级的肯定，乃至走到职业生涯终点时，还能哼着快乐的小曲享受生活。这是第四个看点。

虽然我也出版过9本书，但都是教育和药学的书。每一本都耗力不少，从不敢涉及文学，深知写书的不易。王毅然同志退休前，就出版过几本小说，退休后依然耕耘不辍，让我钦佩之至，而且在退休后的作品里依然可以看到草木生发、人间温暖。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能力，我想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职业人生的深刻洞见，以及文学的良好基础。

感谢作者，为读者带来一本好看的小说。  
(大理大学原副校长、二级教授)

###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 张锡梅

今年暑期，夜以继日，读完了王毅然先生的《归去来兮》，这是近些年少有的能一口气呵成读完的作品之一，这也让我佩服于作者讲故事的能力和细腻的文笔。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作者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为作品名，其不言而喻。这部长篇小说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八十年代以来生活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的故事，是年近古稀的王毅然先生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建构。

网络上有段话：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三段恋爱，一段懵懂，一段刻骨，一段一生。也有人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人生总是会有很多遗憾，文学家会把遗憾付诸作品，让它承载作者的理想。《归去来兮》建构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恋情，分别是：

始于初恋，那是人一生的白月光。“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林苍秀是耿卫疆一生的意难平，

之后再次相逢，已是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林苍秀成了耿卫疆永远的白月光。

忠于妻子，细水长流的夫妻是平凡世界难得的温暖。在芒弄街的赶集日，耿卫疆对马玥明一见钟情。玥明，是耿卫疆一生中的明珠，他此生最大的幸运，是拥有一个与他“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知心爱人。

透过这段感情，我们也看到了边疆年轻干部的成长历程，从芒弄公社的行政助理员到正厅级领导干部。他的成长，离不开稳定家庭的支持。作为妻子的马玥明，既是贤妻，又是良母，正因为她的大度与信任，耿卫疆才能在仕途上不断进步，在工作上毫无顾忌地坚持立场。在处理郊区小学踩踏事故的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了耿卫疆作为领导者的胸襟和气度，也看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平凡夫妻的深厚感情，因为有这么浓烈的情感滋润着耿卫疆，他坚定地拒绝了种种诱惑。

悠悠，名字就给人一种很悠闲、自

在的感觉。秦悠悠，是耿卫疆从政之后认识的省城记者。她和耿卫疆一样，始终关注边疆的国计民生为己任，把沧江县青壮年劳动力输出到深圳，是她联系的。如何解决缺血少药和教育落后问题，她给了耿卫疆很多有益的建议。他们更多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精神上彼此契合的关系。

这三位女性，是耿卫疆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撑，他们陪伴着耿卫疆从青涩的少年走来，一直走向人生的终点。

总而言之，读完《归去来兮》，感觉作者想要表达一种理想的生活：仕途上浮沉半生，仍然能守住自己的初心。少年时感情上稍有欠缺，中年邂逅了与自己精神高度契合的异性知己，一生与妻子过着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晚年实现人生理想，过上了“观云海、听雨声、闻鸡鸣，读书、写作、禅修的世外桃源生活”。

致敬作者，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别开生面又一季，宦海沉浮归去来

□ 饶峻峰

王毅然先生的长篇小说《归去来兮》分上下两部。上部讲述了主人公耿卫疆从知青到军人再到地方干部的人生历程，通过他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西南的社会变迁，歌颂了改革开放。下部讲述耿卫疆的初恋情人林苍秀因早恋受到惊吓而出走，在异国他乡经历战火，当文艺教师，做生意，患难中觅得终身伴侣。小说立足边疆，挺进中央，映射大时代的变迁，是作家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审美升华。叙述角度多重转换，叙述时空交错剪辑，双线索交叉推进，蜿蜒盘旋，峰回路转，形成一种独特的互文呼应关系和文化实践。新颖的角度，别样的手法，写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其间渗透着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鲜明的地域特点，张扬着一种复调的乐感和厚重的文化力量。

《归去来兮》体现了一种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对生命意义的表达，这里有作者的体验和思索，也有矛盾和困惑。趋于家常的方式传递着朴素真挚、明朗豁达的民族精神。笔触涉及多层面，多领域，真实刻画了复杂的人

际关系、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作家致力于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与个体存在价值的诗意建构，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陶醉渗透在字里行间。向人们揭示了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凌厉、张扬的美，更有激昂泼辣的生命活力，汪洋恣肆、生机盎然。

小说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的奋斗与挣扎，描绘了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斗争和人性考量，尽量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情感变化，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探讨改革中的社会阵痛与突围。作家深入思考传统与现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命题。突破了单一的文体建构模式，探索多元叙事风格，将文学创作的视野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思想深度。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在写作过程中，有时候稍微偏离了小说技法的轨道，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识地尝试，希望本书略有不同。”通过对特定地域自然景观、风俗习惯、方言土语的细致描绘，构成了滇南独特的自然与

人文景观，构筑独特的文化景观和象征意味。一个个充满了隐喻意味的象征符号，转化为诸多可感可见的客观存在，在多元文化杂糅中体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思考。

别开生面又一季，宦海沉浮归去来。老作家在退休之后依然能笔耕不辍。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激起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所有关于温暖、温馨、温情与爱意的渴望。《归去来兮》聚焦宦海沉浮，揭示世道人心；高举改革大旗，记录时代变迁；凸显地域色彩，探寻创新之路。于苍茫而深邃的时空背景中，挖掘文化内蕴，展现文化肌理，赓续历史文脉，彰显文化气质。既散发着一种清新、天然的生活气息，又呈现出粗朴、自然的文化状态。既表现为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也表现为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刚健挺拔、百折不回的志气，鼓荡于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狂飙突进式的野性与高亢。乐观与悲悯同在，现实与理想共振。

(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作为“动词”的边地

□ 董晓霞

王德威在《华语边地文学：问题与方法》中强调对于边地经验的书写与想象正是华语文学最具特色的领域，“‘边地’的含义并不止于政治地理的限定，更延伸为一种心理困境、一种族群、文化、经贸的接触、交错或隔离的情境，甚至是一种想象时空的投射”。“边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动态之中。边地文学并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而是塑造和影响现代文学现代特征的动词性存在。“交融”和“祛魅”是笔者读了《归去来兮》后两个印象深刻的动词。

首先是“交融”。《归去来兮》中明显表征就是血脉融合。耿卫疆的母亲是傣族土司的妹妹，父亲是山东籍解放军排长；林苍秀的父亲为四川籍中国远征军，母亲祖先是明末清初跟随南明小朝廷末代皇帝朱由榔逃难而来；马腾飞讲述祖先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迁徙过来；李岩的父亲是重庆籍远征军军医；“共饮一江水”的妙塔国掸邦科甘特区小清河区区长、口岸开发办主任赵若布勒的母亲

是佤族，父亲的汉族祖先是跟随中国皇帝逃亡而来的。在耿卫疆和马玥明结婚时，马玥明就说他们是“民族团结进步”一条线之家，因为马玥明的爷爷是汉族、奶奶是彝族、外公是佤族、外婆是拉祜族。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身处云南边地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设置并不是虚构，而是很多常态和事实。

《归去来兮》的故事空间是在汉、傣、佤、彝、拉祜、布朗、傈僳、景颇等多民族共居的勐玛、沧江、临江、林山、拉曼、国门、口岸、界河、界桥、界碑也经常出现。胡安·诺格在《民族主义与领土》中说：“20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在人类和世界历史上，我们所有人都第一次生活在一幅地图上。”“边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是具体可感的物理界限，更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中最突出的象征。主人公耿卫疆的工作轨迹更是人如其名，还有支边、丁爱民、康太平等人富有深意的名字。作者用人物形象的血脉融合、地理溯源、文化想象建构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如同一根纽带，实现了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

其次是“祛魅”。在传统中央帝国时期，“边地”是中原则以外的“四方”。对云南的记述，除了凸显异域殊方的野蛮神秘和奇风异俗，更多记载的是中央对云南的治理沿革，叛乱、归顺、朝贡与平蛮、羁縻、教化。而在消费文化成为云南文化想象的主要推动力的当下，出现了一种神秘化边地的倾向，是异域的“他者”，是文学的“例外状态”。然而，《归去来兮》并没有把边地奇观化，没有复魅，作者写的是一种日常。如到境外参加游击队的林苍秀的人生可谓传奇，极富野性魅力，但作者讲述时却没有刻意渲染，更没有“自我他者化”“自我风情化”，叙述语调如同林苍秀讲述的佛寺中老长和小和尚撒草籽的故事——随性、随遇、随缘、随喜。作者用历经风雨后的达观态度告诉读者：人生的意义唯有遵守生命的欠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

(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稿件由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理大学)提供]